

目 录

汉口匹头业五十年见闻录·····	吴禹门 余祥甫	(1)
武汉棉纱商业之兴衰·····	周新民 程霖轩	(12)
回忆鸿彰永绸缎店·····	马悦庭	(25)
汉口怡和布店简史·····	肖泽如	(39)
武昌维新百货店七十年·····	刘广仁	(50)
汉口的盐商·····	陆钦棠	(58)
武汉蛋商行业史简述·····	吴子净	(69)
汉口汪玉霞发展史·····	邵 强	(80)
武昌曹祥太杂货店·····	曹美成	(92)
冠生园食品公司史略·····	易冠生	(100)
记汉口黄志成拆货店·····	王经腹	(115)
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	陈 醒 陈立廉	(116)
旧武汉茶业的回忆·····	程静安	(134)
汉口国漆业的变革·····	涂产志	(144)
汉口沈家庙山货行见闻·····	葛剑吾	(150)
解放前五十年的汉口参燕业·····	李杏三	(161)
武汉金同仁药店始末·····	金溥临	(176)
汉口元记牲药材号·····	郑少霖 张玉书	(182)
张万顺折药店的兴起和没落·····	刘幼龄	(194)

武汉科学仪器业的回顾.....李景紫 (199)

汉口邹紫光阁笔店.....邹彝新 (202)

武汉典当业略谈.....董明藏 谭光熙 (207)

汉口邹协和金号.....邹凤祥 (215)

汉口晋和铁号.....笨 伯 (229)

忆刘庆隆煤炭店.....刘鹏轩 (239)

鲟鱼大王与老大兴同.....何饒李 (245)

三任汉口商会主席的黄文植.....黄叔龙 何瑞保 (250)

淮盐商胡廣堂.....何瑞保 胡絅丞 (258)

※ ※ ※

《武汉文史资料》《湖北文史资料》《文史资料选辑》

刊载有关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索引..... (265)

两淮盐务执照 (照片) (封二)

查验盐票凭证 (照片) (封二)

武汉市人民政府工商字第一号公告 (照片) (封三)

※ ※ ※

封面题字.....龙从吾

封面设计.....周远贵

封面摄影.....张景隆

汉口匹头业五十年见闻录

吴禹门 余祥甫

笔者从事匹头业务近五十年，仅就在行业中耳闻目睹的一些片断，凑成此篇。惟以年月之久远，回忆不周，尚希知深识广的同志予以充实和指正。

一、汉口匹头号之起源

汉口匹头号，创始于清末，原来分为本帮、太平帮。本帮起初为黄陂、孝感、武昌、鄂城、咸宁等地的商人，在汉口开设的染色布店；太平帮则系安徽太平人，在汉口开设的栏干号（当时妇女习用于服装的滚边）；两帮虽然经营的商品不同，但是都供服装之用，而且以批发为主，与城乡零剪布店，均有往来，所以便形成了后来的匹头号。

海禁开后，上海辟为商埠，首先是英帝国主义运来纱布匹头在市场上出售。它的出售方式，是设立元芳、公平、怡和等三家拍卖行，这就是所谓“叫庄”拍卖，将匹头花色分门别类，逐一译列于单行本上，以便顾客按图索骥。顾客到场人手一本，即按照自己的需要，斟酌市面行情，划算递价指拍，在拍卖时还可临时加价，一直叫到无人再加为止。总之，是谁出的价大，就归谁买进。开始不久，汉口的匹头号也派人到上海去了。

当时匹头的品种有：漂布、细布、太西缎、冲昌缎、羽绫、磅布、红洋布、尺六元青绒，各种类型的花布。货分好次，并有商标，头号的漂布（俗称竹布）有“三箭”“金狗”“头号牡丹”

“泰隆七子，”其次是“人伦伯子”，尚有其他杂牌。头号太西缎是“五经魁”，其次是“风尘三侠”。冲西缎有“称人”。羽绫有“彩八士”“安殿宝”“惟妙惟肖”。细布有“三人枪”。磅布是12磅至15磅。除了叫庄的以上品种外，还有沙逊洋行的“一本万利”漂布。这个商标有深刻的讽刺性，也可说是帝国主义对清朝官吏极尽形容的轻视。它上面绘着一个当时流通的内方外圆的大制钱，从钱孔中伸出一个头戴纱帽身穿官服的头来，四周还堆着元宝，使人一望而知这就是一个贪官污吏。

由于上海舶来品匹头日多，叫庄出售的形式，渐已不能满足英帝国主义的倾销，乃由洋行招请买办来发展业务。于是汉口匹头号也派人到上海设庄采购。由于汉口匹头业的太平帮势力较为雄厚，捷足先登，成立了申庄，以后本帮也随着设庄或请人代庄，兹将当时规模较大的匹头号的牌名列下：

①本帮：德润康，义康隆、履丰恒(后改德懋恒)、葆和祥、厚记、李正兴、正昌、和昌、豫丰、庆太裕、成记。

②太平帮：恒和祥、致和祥、谦庆、祥庆、余厚、懋丰、广源祥、晋裕、德裕昌(后改乾太昌)成余、萃和。

③还有山东帮的谦祥益老号和江苏人开设的诚记。

除以上属于大批发性质范围较大以外，尚有二批发性质的所谓蒲包匹头号，如：晋康祥、茂和祥、同安祥、谦和祥、晋昌祥、锦昌祥、瑞和祥、慎康祥、人和昌等。他们无力向上海进货，只能向大批发购进，替城乡较小的零剪店配记花色，而且多是用蒲包打捆，故名为蒲包匹头号。

民国初年，上海游资充斥，放款利率低微，汉口匹头号就利用申庄出面，向当地行庄贷款，进行大量买货。由于在上海贷款便利，头寸松弛，货物源源到汉，售出便采取放期30天。倘到期不能交还，尚可算息延期，等于是营业之外，又变相放息，竟成为一时风尚。汉口匹头业因此而声势日壮，货物除尽量向蒲包匹

头号 and 零剪布店推销外，同时还扩大客帮销场，并且一直到沙、宜、襄樊、洛阳、西安、长沙、衡阳及两广。在蒲包匹头号方面，也把销售对象从滨江沿河各县，北沿京汉铁路，扩展至信阳、郑州。于是促进了汉口匹头商业充分发挥了汉口商场的集散作用。

二、帝国主义争夺汉口匹头市场

由于汉口匹头业的市场显示了自己的吞吐量，英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略华中，首先利用租界和不平等条约，在汉口开设了安利英、怡和、隆茂、沙逊等洋行，并垄断进口匹头的业务。接着又有德帝国主义禅臣礼和洋行的经营匹头。但是汉口的匹头号尽管有这些近水楼台的进货便利，却都没有拆回中庄，相反地赴申设庄和请人代号的还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日帝国主义纺织工业在此时期已逐渐得到发展的关系。到了第一次欧战发生英、德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日帝国主义便在我国大办纱厂布厂又进一步得到了垄断我国匹头业市场的机会。（以前日本向我国推销的匹头，都是在大阪、横滨等地制造，因此进口必须完纳关税）。在我国大量设厂，其出品均按我国厂商一样，只纳统税，这就不仅有利于倾销，而且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民族工业。由于它掠夺原棉和倾销纱布，在汉口设立的日商洋行即达20余家之多。差不多每家都有经营匹头的经手人，真是渗透了整个汉口匹头业。现将历年日商行名和中国经手人表列于下：

行 名	中国经手人	行 名	中国经手人
三 井	马 筱 菴	吉 田	朱 干 丞
三 菱	王森甫 胡敬之	荣 泰	余 秀 章
伊 藤	余仰高 陈焕臣 汪春华 代玉书	武 林	金 理 卿

续上表

阿部市	吴项唐	熊明轩	斋藤	陈汇川
目信	马琴元	喻春培	林大	王东舟
东棉	高云青	汪继先	市田	夏敬斋
多田	高玉峰	唐玉山	丰田	汪继先
岩井	孙萝权	陈紫安		
	樊芹香			

他们对于棉纱匹头的经营和竞争除现售之外，大部份是订定期货，定货不收定金，期限灵活，由一月至一年不等。定货到期出货不收现金，可由买方给予一个月期的上条，到期由钱庄介付。期货到达，一时不能出货，亦可进行协商。不过后来因有个别匹头号受外汇亏累，所出上条到期钱庄不介，始由洋行规定，改上条为十天期的钱庄支票，方能出货。日商洋行看到英、德商洋行出售匹头按每匹规格的30码—40码，均须一一过尺计算长短，若长一码半码或者四分之一码，也要锱珠必较，它就将每匹规格，按30码或40码固定下来，而且每匹放一至四码不等，作为优待买方，这样就对于零售布店便有划算了。不仅如此，有些品种还在每箱匹头中，另放五码至十码的样布，无形中是等于增加了批发商的一笔利润。每届年终，还分送有关厂商印有出品商标的月份牌和日历。平时也赠送精美的日记簿或其他宣传杂志，并以经常宴会的方式，听取商情、市场动态和征询对商品的意见，这种勾心斗角的竞争，加上貌似亲善的联系，不仅在第一次欧战期间它已经独霸了汉口市场，就是到了战争结束，英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时候，也感到只有退避三舍了。

三、日行中国经手人的需索和东汇的涨跌

日本洋行在汉口利用中国经手人一一即买办，对于匹头业市

场逐步渗透得到独霸以后，就以默许的方式，让这些买办在售货的时候，对匹头号进行一种额外的需索。从每件匹头中由买办就中剥削一元，每件匹头计有四十匹，所以又称“二五”费如伊藤、阿部市、东棉、日信等，每年所有的匹头多的达到十余万件，至少也有五至八万件，按此“二五”费计算买办的收入实可惊人，一般人当着这些富家翁是恭维备至，可是背转身来却痛骂他们是“二五”洋奴。

为什么这个“二五”会变成买办的规费？主要还是汉口匹头号鉴于就地向日商洋行进货，比较向上海进货要便宜些，即令是申庄没有撤回，也无形中把进货中心吸引到汉口来了。起先还是由于匹头号中，有一部份投机性强的人见到缺俏之货就想多买和争取优先到手，就暗许买办每件货另送一块钱。由于是附耳之言所以亦有人把“二五”费称为“耳朵”。经过买办的串通影射，于是逐渐形成了例规；到了货不太俏的时候，想割“耳朵”，买办就不谈生意了。

日本纱布卖出期货居多，最初定货以日元为单位，交款按当日东汇牌价，实收洋例纹银折合。（以前英德洋行定货也是以英码为计价单位的），日本洋行所来的匹头，都是由日本银行做押汇来的，东汇汇率时有伸缩，定货人那一天结汇，就依照那一天东汇的牌价，日本洋行只能代向银行办理手续，涨跌由定货人负责。定货期间虽不结汇，当然是可以任凭定货人买存日元，而出货期间有款交与洋行，也不限定马上结汇，但也不能越出一定限期。总之，这样看涨看跌是冒着风险的赌博行为，而且往往为银行所操纵。

东汇是指日本对外贸易的汇款，初期日元合洋例纹银七钱，至第一次欧战后，受日本金融动荡的影响，日趋下跌，到1919年就跌到四钱至五钱。当时“鹿三福”细布每匹价为八日元，约划洋例纹银三至四两，这是一般较为正常的情况。后来日元一直跌到二钱八分，由此一来，按四钱汇率定货而未结汇的匹头号，可

以说是得到了投机的胜利。再以“鹿三福”每匹来折算洋例纹银就只有二两二钱八分了。有的人是心满意足，有的人是贪心不足，还望再跌。以当时的定货较多之家来说，如李正兴至此仍徘徊观望，而其另一负责人李森山则不同意并说“当前日本金融出现不景气我认为是暂时的，他是战胜国之一，决不能任金融一蹶不振”，由于他有这样一论断，所以就将东汇结了一大部份，到了后来日本银行后来“轧空”的时候，吃亏较小。再如德润康负责人余玉明只认为他有李紫云的东家，资力雄厚，还是看跌，等到东汇回升的时候，又不肯忍痛了决，一误在误，以致亏累甚鉅，由此营业不振，终于关门大吉。象这样倒闭的，还有仁和祥李森太及顺风纱号等。

四、在抵制日货中的勾心斗角

抵制日货，多数人是出于爱国热情，可是也还有少数人别有企图从中搞鬼。匹头业在两次抵制日货中都发生了勾心斗角和阳奉阴违的可耻事件。

1912年日帝国主义勾结窃国大盗袁世凯，秘密签订卖国条约廿一条，1919年，“5·4”学生运动激荡全国各大城市罢工、罢市、游行示威，武汉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并即成立了外交后援会，郑同泰、郑慧吾召集武汉各商业团体在花楼正街小关帝庙开会，反对卖国主义外交政策，要求取消廿一条，宣布对日经济绝交，不卖买日货，凡与日商订货物的，均责成团体负责人将契约一律登记，出货时办理手续，出完为止。匹头公会会长萧纯卿即通知同业会员本着爱国热忱，与日本洋行绝交，定货登记，出完为止，倘有不顾国耻甘心媚日的奸商，仍与日商往来，所买之货则由外交后援会截留，并予以惩罚。这该是多么大义凛然；但由于内部矛盾处理得不好，竟被日本洋行买办钻了空子。

当时的大匹头号，由上海来货，也向汉口日本洋行进货，转

手售于蒲包匹头号，是有一定的利润和期限。蒲包匹头号与日本洋行挂上了勾，也同样能够买货或定货，甚至有少数拖欠大匹头号的货款到期不还，宁肯认息，都要争取与日行往来。在大匹头号方面早已对此不满，而洋行买办为大匹头号要割他们的“耳朵”，早有成见在心，又从中加以挑拨，一面支持蒲包匹头号照样向洋行进货，一面又唆使大匹头号云函日本洋行制止未入公会的蒲包匹头号，（它们属于大布业同业公会）不能直接向洋行买货，弄得妒嫉日深，不能相容。到了对日经济绝交的时候，匹头公会会长肖纯卿，对于意有申请入会的，还要五百纹银的入会费，蒲包匹头号认为这是大鱼吃小鱼的欺人手段，就坚决不买这笔账，既不入会，还暗中与日本洋行往来。经过日本洋行买办一怂恿，并由日本洋行凡是经营纱布的各出二百元交与蒲包匹头号，另行组织新的公会，果然不久，新的匹头公会就在紫竹菴维新里一号成立了，共有会员复茂祥、晋康祥、恒昶等十余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抵制日货运动也受到了破坏。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在汉口总商会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外交后援会，主持会务的有周星棠、贺衡夫、黄文植、肖纯卿等。成立之初、较前次办得进步，门前设有木笼，备作不知国耻的奸商之用，如敢尝试囚入笼内，任人观看。开始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不料后来在匹头行业中居然有人以日人为护符，和与反动派警察勾结，干出了无耻的偷运日货事件。

日本浪人金刚，一贯贩运军火，为了掩护，就在日本租界开了一家要货店，名叫永进洋行。匹头业有田善夫其人，竟与他们勾结，始而偷运日货，由于有利可图，就进一步在黄陂街鲍家巷口开了一个永庆祥匹头号，大量贩卖日货匹头。由于当时的贪官污吏惧怕日本人，同时也与他们勾勾搭搭，所以一直没人干涉。

还有个丰记匹头号，设在黄陂街瞿家巷口，老间陈辉五利用他的儿子以小开身份加入了财神庙保安会充当义务消防员。由此

就结识了警察第五署署长，并且依靠这个后台，干着偷运日货的勾当。丰记隔壁就是日商前田一二洋行经手人魏景倩又与他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在匹头号中有定有日货匹的，即可通过丰记这个小开的关系，来进行私运。他们的方法是，事先由日商将货物提在前田一二洋行之内，到了深夜才进行分送，而且是贿通警察五署派出警察戒严。上自鲍家巷，下至打扣巷一带，禁止行人，只让他们搞偷运活动。他们以为是人不知，鬼不觉，那晓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终于还是被揭发出来了。

五、突破市场不景气的泰和裕

1921年前后，纵横豫鄂皖三省的白朗起义军反围剿战争和军阀之间的湘鄂战争，使城乡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而鄂北豫南皖西等乡镇又均与本市匹头号有往来关系，而且都放有乡帐，不免有所损失。如大匹头号的义康隆，蒲包匹头号的晋康祥，均亏累不支。许多匹头号纷纷歇业，勉可支持的仅及原有家数的三分之一。这时有一家后起的蒲包匹头号泰和裕就敏感到这还不是业务没有搞头的问题，而是放了乡帐风险太大的关系。开始改变了经营作风。一些大匹头号也理解到这一点，也有人实行求现不赊的薄利多销的办法，可惜不能坚持，遇到市面稍一好转，就把那种互相倾轧，“赌行市，争乡脚”老一套拿出来了。到了1931年武汉大水以后，都变成奄奄一息了，仅存者也只有底子较硬，作风较稳的成余、德懋恒、仁和、同义祥、乾泰昌、复茂祥、福成和、裕懋隆、谦祥益老号等十余家。在这样不景气的日子里走到1935年，碰上了政府币制改革，一般纱布都要涨30%，对于匹头业等于打了一次救命针，由挽转厄运而大获盈利。特别是在上海定货较多之家，莫不市利三倍，据说这是“二十年来的仅见丰收之年”。究其中而能实至名归继续立于不败之地的，我看只有德懋恒、泰和裕两家，尤以泰和裕在营谋方面，具有不同流俗的独特精神。

泰和裕原为蒲包匹头号，开业于1919年，资金纹银四千两，由吴捷三，李少侯等合伙组成。初期范围很小，由于他们谨小慎微，克勤克俭，营业才逐渐扩展，从开业之日起，到1938年武汉沦陷止，整整三十年盘存下来实有匹头壹拾贰万匹，若按市价银圆拾元一匹计算，即达一百二十万元之鉅，它这一特大的盈利，在一般工商业者中，应该说是不多见的。它的营业方针也只是，不赔账，便宜卖，以现求现为主，所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薄利多销，有时有些品种只赚木箱麻包等包装。正因为这样，所以它的周转极快，三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这样就把牌头做出去了。不仅招徕了零星水客，尤其是吃了别家架面的字号，也抽出一部分现款来向它买货，特别是1931年大水以后，别家门可罗雀，它则门庭喧闹，它突破了市场的不景气，发展迅速，使人感到惊奇。

六、沦陷时期的匹头业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有些汉口匹头号逃往重庆，有些则调了一部或大部分资金到上海存了一批货物在租界洋楼中。较多的匹头号则将大部分货物存于汉口隆茂和平打包厂仓库，有货之家多欲仰求洋人保护。甚至有一部分人存在着“日本洋行来了还是可捞一把”的思想。日寇到了武汉，日本洋行果然随之而来。经营纱布的洋行以伊藤、阿部市、东棉、日信、林大、江商来货较多，三菱、市田来货较少，其中如林大、江商、市田则系新来的洋行。这些行家的买办多为蝉联、亦有新雇，对于“二五”剥削大大超过以前，因此，几年之内莫不脑满肠肥，腰缠累累，面团团作富家翁矣。至于避入法租界的匹头号其实力雄厚的都保持不动，而多数资金不多的，惟恐缠头金尽，好景难留。又邀约一、二人或三、五人打伙，想尽办法，凑本弄货，到通衢要道去摆设地摊，有的还沿街叫卖，逐渐就由流动布摊变成了固定摊贩，由戥摸经纪而变成了成批转手，于是就有人搭上半边门面，或租定整间铺

屋。通过这样的发展，这就引起了大老板们的兴趣，才又有人搭股合作，于是上段汉正街（日寇划为难民区）有生记、合记、森记等十余家，中段统一街有邱义盛、晋记兴、永兴祥等十余家。下段特三区有经华、鸿安、元懋等十余家。它们固然是以零售为主，有的并备具了匹头号的雏型规模。在这段时期，不少人为了巴结日本洋行的经手人和有钱有势的大老，经常潜迹在新新、万国、铁路、华商、安乐等旅社中，或流连于新成里，永贵里、如寿里等妓院里赌博、抽大烟、狂歌侑酒。以期达到扩展业务的目的，这是当时最普遍地情况。

日寇侵略者久陷战争泥潭，战略物资，军事供应，日益缺乏。1944年在汉口市场上就来了一个统制物资的措施。将纱布号、绸布门市店指定为组合许可商店，存货按数登记，不得隐瞒转移，以备其随时征购，当时各匹头号存于洋楼的货物，几乎全部被征，并且指定匹头号为一组，以王理堂为组长，门市店为二组，以成禹门为组长，组长均胆小怕事，任凭日寇作弄，从征购数字来说，一组泰和裕二组谦祥益被征最多。

当其在已登记来征购之前，敌伪又成立了经济警察署，署长柯大树，台湾人，为日寇有力的帮凶，署以下设检查股，股长高书远，是天津著名的流氓，股以下设有检查班，一般均呼之为经济班，分为六个班，每日分班结队到各商店藉检查进行敲诈，作恶多端。

是时武汉并曾成立纱布交易所在东棉洋行楼上，由日人村边主持会同曾亚东、唐兰樵、王理堂等组织而成，专以买空卖空和大鱼吃小鱼的手段进行局骗，并有地痞流氓混杂其间。当时以聚丰永纱布号经理曹植栋进出最大，他有两个后台：一是中江银行负责押款的朱震钧（浑名朱包），一是法租界大舞台老板刘某。由于这两个后台，有现款可以大量购进，买进了又可以有押款的便利，所以能够左右场面。另外还有个梅幼云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也极

尽了投机之能事。

七、胜利后的买空卖空和倒风

持久抗战胜利了，在沦陷七年的武汉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匹头行业中人，也是喜形于色地从原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先后复归复业的有，仁和、泰和裕、鸿兴祥、乾泰昌、复成和数家。改组或新旧合并有大隆、晋记、兴华、德昌、永兴祥、邝义盛、群力、自力、协和等十余家。另外还有仅凭人力而乏资本专搞行庄贷款的如大康、协昌隆、太康等。由于黄陂街已成废墟，他们便集中在统一街民权路一带。初时都很活跃，嗣以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又演成了倒闭之风。大康、协昌隆等倒闭以后，虽尚存二十余家，而营业旺盛发展的只有大隆、仁和、泰和裕、鸿兴祥四大家，余下则为邝义盛、晋记兴较为活跃。

倒风还未平息，在纱布市场又起了一种歪风，就是曾亚东、彭少田、刘斗南等联合金帮、棉花、颜料帮，步敌伪时期的后尘，在利济路设立的交易所，一些疯狂的投机之流，站在陷阱边上拖人下水，把买空卖空说成是“抢帽子”实际落下陷阱的却是那些有侥幸心理的商人。如袁福记老板袁福藻由挑贩而到汉正街摆布摊起了家，开了店，营业也还好，就是贪心不足，便投入交易所的陷阱中去了。当然其他更为恶劣的事例还很多，这里就用不着说了。

解放以后，彻底消灭了这些歪风邪气，再也没有人干这种投机活动了。匹头号资本家，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退了休，也是过着心情愉快的生活。与那种唯利是图患得患失，忧心忡忡的旧日生活对比起来真是有天渊之别。

(1964年3月写成)

武汉棉纱商业之兴衰

周新民 程霖轩

武汉的棉纱商业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解放后棉纱实行统购统销时止，全部历程只有半个多世纪。在这五、六十年里，它也同样其他民族工商业一样，经历了满清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受到种种摧残，特别是在武汉沦陷时，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压榨，使得整个棉纱业几度濒于绝境，有许多纱号免不了走上停业甚至倒闭的道路。有的虽是经营得好一些，但也很少能连续经营到十年、二十年以上，多数是只经营了五六年或者十年八年，就告歇业或因亏损过多而倒闭。到解放初期全行业转向时，根本找不出一家纱号是从汉口有棉纱业开始而一直经营到底的。我们从事纱商业有年，对整个行业的历史并不全部了解，这里只就我们耳闻目见，以及向原纱业同业的人士中访问所得，写一些零碎情况，供研究这个行业兴衰史的参考。

一、汉口棉纱商业的兴起

汉口虽是九省通衢之地，早在数百年前即已是商贾云集，交易纷繁，但在百行百业中，却无棉纱这个行业。直到前清光绪年间，才有少数贩卖棉纱（当时称为洋纱）的摊户，他们也不是专营棉纱，而是同带子、栏杆、花边等商品一起兼营的。棉纱来源是由经营洋广杂货的商号从广州购进的印度产品、如“红入枪”、“红洋房”等牌子棉纱。随着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加深，英、法、德、日等国先后来汉口开设洋行，看到棉纱走销日旺，有利

可图，就积极插手经营。于是英商怡和、老沙逊、安利英、德商礼和等洋行也运销棉纱。这时运来棉纱的牌子增多，计有“五福”、“牧羊”、“五子”、“送子”、“聚宝盆”以及原有的印纱“红人枪”、“红洋房”等等。洋行为了打开销路，占领市场，他们雇用华人当买办，由买办负责将棉纱销售给经营棉纱的摊店，并采取赊销方法，先取纱，后付款，赊期一般为五十天。由于进口的棉纱比国内手纺的上纱色白条细，深受各织户欢迎，所以贩卖棉纱的摊户营业很旺，加之是赊购进来，赊期既长而销售又快，获利颇丰。为了扩大业务，谋取更多的利润，兼营棉纱的摊点就陆续改为棉纱、匹头两者兼营或专营棉纱的商号，如当时的义和祥匹头、洋纱号，和胡瑞记洋纱号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商三菱、伊藤、三井、日信等洋行也运进日产棉纱，争夺市场。运进的纱品种较全，如16支“美人舟”、“丹凤”、20支“财神”、20支和32支“双鹿”等，日商洋行不用买办，只雇用华人为经手售货人（实质上也是买办。不过比买办权力小一些），由经手人负责销售，也采取赊销办法，以与其他外商洋行竞争，但将赊销期缩短为四十天。这样，棉纱来源增多，销售也日渐扩大，因之纱号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夕，汉口的纱号已有了二十多家，计有葆和祥、胡瑞记、义和祥，大德裕、同升恒、晋裕、宝康、太和、同顺祥、复兴祥、履丰恒、毕仁丰、振兴等牌号。

约自1914—1925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是汉口棉纱业的黄金时代，纱号最多时曾达到四十七家，都较殷实，其资金自纹银一万两至四、五万两不等，此外各家纱号还有银钱业不同程度的放款和临时性的支援，购销业务颇为旺盛。

当时纱业中有的人看到纱商业终属贩卖性质，其货源操在纱厂和洋行之手，如果改变销售渠道，则全体纱商将处于无货可卖的困境。于是由孙志堂、胡瑞芝等人发起，从纱业同业中集资七

十万两纹银同停办了楚兴公司的张松樵出资纹银五十万两合作开设一个纱厂，定名为裕华纱厂，由孙志堂担任总经理，在收集股金和筹备设厂中，因纱业中发起人经手将收集的股金放了两笔“倒账”，因赔偿问题，发生了分歧意见，同时在订购机器方面，发起人在外汇看跌时未及时结汇，后来外汇猛涨，造成很大的差价损失，也引起了股东的不满。加之纱商业受日本洋行抛售“三品”的巨额亏损（三品的解释见后），对原认的股额也无力缴付，因之合作未成。结果由张松樵同其他原楚兴公司的股东徐荣廷、苏汰徐、姚玉堂等人单独开办裕华纺织公司。纱业中人员仍有认股投资的，但为数不大，有的人担任了董事，不过备位而已。

二、汉口纱业公会的建立

由于经营棉纱的商号增多、业务增大，与外界的联系也随之增繁，为了维护同行业的利益，纱业中人都觉得要有一个行业组织，以便共同协商有关本行业的大事。因当时许多纱号都兼营白布业务，有的还是以经营花色匹头为主的，于是在前清末年就同匹头业共同组织了匹头洋纱公会。民国元年以后，外纱进口日益增多，本地和外县农村织布、织带、织袜、染纱、毛巾等业相继发展，用纱也增多。更由于洋行卖纱是成件（每件40捆）出售，他们并不直接卖给这些用户，而这些用户也一次买不起整件，只能向纱号零星购买。那时也有些外地客商是买整件纱的，洋行也不直接卖给他们，无论是本地用户或外地客商都要通过纱号来购买。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汉口纱商业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购销两旺的新兴行业了。与此同时，投向经营棉纱的商业资本，也日益增多，有的还是从其他行业转业经营的，如当时同业中资金较雄厚的葆和祥就是从布匹业转来的，厚成和厚记两家是从土膏业转来的，后来棉纱走销更旺，不仅湖北省内销量日大，而且远如云、

贵、川、湘、皖、豫以及山东、陕西等省的商号，有的在汉口设庄长期采购，有的随时派人前来洽购。汉口纱商业利用这一优势，使业务得到不断发展，经营的家数也增加到三十多家，他们多设在黄陂街、梳子街、升平街、戴家菴、青龙街这一带（解放后这里称为重划区，即今大兴路，和平里这一带），有的批零兼营，有的则专营批发，可以说是汉口纱商业的第一次繁荣时期。同业中人感到本身日益壮大，不宜再同匹头业合在一起，认为有单独成立公会的必要，于是在戴家菴租得民房成立了汉口棉纱公会。随后又在升平左街（今黄陂街后面）购买地皮兴建公会大楼，建筑费用除动用公会原来抽存的基金以外，又由会员纱号自愿乐捐，同时还向会员纱号征收会费，按各家资金多寡分为甲、乙、丙三等，计甲等户收纹银八百两，乙等收六百两、丙等收四百两。新的会所于1913年建成，首届会长经同业公推同升恒纱号经理汪荫庭担任。

按当时情况来说，棉纱公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也兴办了一些为同业服务的事业，公会是洋式三层红砖楼房，一楼设有文娱活动室，有报刊书籍，各种棋类，还有弹子房（拾球），供会员和职工阅读和娱乐。二楼有会客室和会议室，三楼是公会办公室，还办有夜校，以同业纱号中的中青年职工为对象，补习文化和珠算，此外还有学习日文的专班。在维护同业利益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当时日本洋行看见棉纱走销畅旺，并且已经垄断了棉纱运销市场，就提出废止四十天赊销期，改为款货两交的销售办法，因事关全体同业切身利益，公会即出面与洋行力争，经多次交涉，结果维持了赊销办法，将赊销期缩短为三十天。此外还商订了一项协议，规定洋行售纱给纱号，应以盖有公会公章和负责人私章的介绍信为凭。纱号如到期不出货而产生了价格损失，由公会负责补偿，假如纱号倒闭所欠洋行的货款，也由公会负责代为偿还。但洋行如不凭公会介绍信卖出的货，不论发生何